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RIBEN DE ZIHUAXIANG YU TAHUAXIANG

崔世广 张建立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RIBEN DE ZIHUAXIANG YU TAHUAXIANG

崔世广 张建立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 崔世广, 张建立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 - 7 - 5161 - 8126 - 3

I. ①日 … II. ①崔 … ②张 … III. ①日本 — 文集
IV. ①K313.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981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文一鸥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16 千字
定 价 9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编 李 薇

编委会 李 薇 王 伟 崔世广
胡 澄 张建立

总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系列成果。

“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往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制订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着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研究所根据学科发展特点,合理配置资源;加强科研队伍建设,鼓励学者潜心研究,注重学术积累;创造优良环境和条件,促进青年学者成长”。2009年,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的重点学科。这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研究所等各级机构对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视,对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将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努力致力于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

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成果不断增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仍存在着研究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深度的精品研究成果不多、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不够大等问题,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例如,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加深,我国广大民众对日本问题的关心、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各种关于日本的信息充斥媒体,其中当然也夹杂着不少误解与偏见。但是,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未必很好地回应了人民群众这种了解日本的需要,半个世纪以前的《菊与刀》、《日本论》等著作近年来仍在不断出版刊行就是一个明证。另外,随着漫画、动画、游戏等为

2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代表的日本大众文化的流行,日本大众文化受到全世界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但是,日本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在哪里,其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并没有给出及时而合理的解释。再者,尽管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国家的整体影响力在下降,然而日本毕竟是一个成熟社会,其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其文化战略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但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却未必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满意的回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十分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进行梳理,以搞清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主要使用了什么研究方法,形成了什么研究优势,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等。即通过引入“学问的学问”、“研究的研究”的方法,促成今天的学问与过去的学问之间的对话,搞清不同时代的研究视点的差异,在理解这种差异的背景和意义的同时,努力发掘出在今天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以资建立科学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要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还必须打破以往研究的封闭性,追求开放性的研究。应该承认,从整体上来讲,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存在着很明显的封闭性倾向。不仅与其他学科之间、与国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意识不强、渠道不够多,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界内部的交流机制也不够健全和通畅。对内、对外交流的不足,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带来了研究的狭隘性,阻碍了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将把重点学科建设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提倡学科内外、国内外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举办讲座、讲演、小型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开展共同研究等,建立对内、对外开放的“学问间的对话”机制。目的是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双向及多向的交流,借鉴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视点和研究方法,构筑对内对外开放的、通用于世界学术界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关键是要进行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体系的创新和研究成果的创新。首先,我们将秉承以往的风格和传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把日本社会文化放在世界的视野、亚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注重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和

借鉴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出和创建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开展系统的、体系性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有着统一的内在原理;其又由若干侧面和层面所构成,有着具体性、重层次性。我们将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按照学科布局和规划,重新集结和调整研究力量,注重和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体系性研究。即从日本社会文化的整体着眼,重视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各个部分的深入研究,形成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第三,努力推出精品研究成果。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体系的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研究成果的创新上。我们要通过研究室和研究人员的学科定位,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优秀研究成果的问世,以创新性研究成果回应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学术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我们还在研究体制上作出了调整。即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框架下面,成立了日本社会研究室和日本文化研究室。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是有着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领域。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深化我们的研究,我们作出了上面的决定。日本社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社会体系的研究,即对日本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等进行研究;(2)日本社会问题的研究,即对日本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众媒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社会政策、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等。今后,日本社会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兼顾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方针进行研究。日本文化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文化特性的研究,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及特征等进行研究;(2)日本文化诸侧面的研究,即研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人格形成、心理特征等。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文化的特性、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国民性格、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大众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今后,日本文化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基础性、理论性研究,兼顾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方针展开研究。我们相信,这样的学术分工和定位,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研究,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

出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是日本社会文化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研究系列,主要反映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成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论文集系列,主要反映学科综述、

4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成果。这套丛书的每一部,都经过编委会的严格审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中国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发展尽到我们的一份责任和力量。

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担负着更重的责任。我们将与学界同仁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繁荣和进步。

丛书编委会

2010年8月22日

目 录

战后日本的“战后”意识

- 以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为中心 崔世广(3)
战后日本政治精英的日本自画像 张建立(16)
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 [日]米原谦(37)
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与相对化意识 纪廷许(55)
试析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 唐永亮(63)
中日相互认知的差异与“文化冲突” 刘金才(77)
试析战后日本“自我”主体性确立依托的精神资源 田庆立(86)
全球化与日本社会的无缘化 周 韬(95)
日本民族优越感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期待 郝祥满(107)

上代日本的自然观

- 以《古事记》为例 杨清淞(124)
日本人的“格”意识 胡 亮(138)

二

- 战后日本对华认识先行研究现状分析 管秀兰(157)
谈谈日本近现代汉学家对中国的理解和不理解 ... [日]横久保义洋(174)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 杨栋梁(188)
试论明治 20 年代政教社国粹主义者的中国认识 王俊英(199)

2 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

杉田玄白的汉方医学观	赵德宇(217)
日本近代小学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谭建川(225)
日本诗人金子光晴的近代中国图像	徐静波(237)
文化他者化的中国形象	
——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	吴光辉(254)
日本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心理文化学分析	游国龙(264)
后藤新平的对外殖民观	
——以其台湾殖民政策为中心	熊淑娥(277)
辛亥革命以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薛天依(289)
从时代小说看日本人的世界认识	
——从藤泽周平的《桥之物语》说开去	[日]饭岛一彦(315)
对外认识与本国形象	
——以近世日本知识分子为中心	邢永凤(323)
试论日本近世儒者“文化认同”的双重取向	
——以“华夷思想”为中心	殷国梁(331)
日本汉诗的文化解读与历史评价	
——以“和臭”、“和习”、“和秀”为中心	郭颖(342)
简析本居宣长的中国观	
——基于对其中中国文学观、“圣人观”、“天命观”的考察	高伟(352)

三

“日本人论”的盛行与“缘人”的自我认同

——心理文化学的视角	尚会鹏(367)
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	
——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学科建设及其方法论的摸索	王敏(374)
编者后记	(395)

1

战后日本的“战后”意识

——以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为中心

崔世广

近年来，日本的战后体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植根于战后体制的“战后”意识也在发生变化。本文拟从战后以来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几次大的斗争和攻防为基本线索，对战后日本的“战后”意识的变迁及其特征进行探讨。

一 战后体制的确立与“战后”意识的形成

日本的“战后”意识形成于战后初期，即1945年到1952年的所谓日本被占领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美国通过日本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日本政府的一切权限从属于美军占领军当局，接受美国占领军的指令制定法令和政策。在这样的状况下，由美国主导、日美两国合作共同构筑了日本的战后体制，即“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的“战后”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战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随之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美国最初的占领方针是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1946年11月，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主导下，经过占领军当局和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与妥协，制定了《日本国宪法》。之后，又按照新宪法的精神，陆续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等，并对民法进行了修改，“宪法体制”得以形成，成为

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石。

新宪法的基本特点在于“主权在民”“保障国民权利”和“放弃战争和军备”。新宪法虽然形式上保留了天皇制，但“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力，“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新宪法第9条还明确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并不再拥有军队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① 虽然在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缺少盟国以及日本民众的主体性参与，但是，新宪法不仅反映了当初美国的占领方针，也反映了战后初期的国际潮流，并得到了日本各阶层及民众的广泛支持。据1946年《每日新闻》在宪法制定阶段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认为“放弃战争条款是必要的”占69.8%，认为“不必要”的占28.4%，^② 这一结果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国民接受和平宪法并不是基于自觉的价值思考选择的结果，具有强烈的“讨厌战争、想和平生活”的被动情绪性特征，但其反映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否定态度，成为以后和平民主意识发展的基础和源流。

但是，1948年前后，随着国际上冷战体制的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惩罚、削弱日本变为扶持、帮助日本，以便将日本建成东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军事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目的的考虑，不顾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国家的反对，开始策划缔结片面和约来结束日本的被占领状态，同时与日本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继续维持美军在日本的存在。1951年9月8日，在把中国、苏联等对日主要作战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日本接受美国的提议，与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片面和约，是为《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日，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另两个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也随之成立。

由于冷战形势下美国转而采取对日宽宥政策，《旧金山和约》对日本来说是十分宽大的议和。《旧金山和约》虽然在第11条写有“日本接受

^① 《简明日本百科全书》编委会编：《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页。

^② 『毎日新聞』、1946年5月27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①但却完全没有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且，虽然日本以接受远东国际审判等结果的形式，在对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认了战争责任，但是东京国际审判以及在日本以外对BC级战犯的审判，都是由外国进行的，日本并没有像德国一样在国内进行相应的战犯审判，没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战争责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另外，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联合国家大都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权，想对日要求赔偿的少数国家只能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决定赔偿的总额和内容，而且这些赔偿大多是以劳务赔偿为基本形式的。应该说，旧金山和约体制成为日本历史认识暧昧、战争责任意识模糊的一个源头，也为以后历史问题的表面化和长期化埋下了伏笔。

日本以实现国家独立为首要目标，不顾与《日本国宪法》的抵触，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明确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陆海空军，“得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而且，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②这样的明显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可以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和长期驻军，而日本则沦为美国的附庸。因此，在日美安保体制的基础上产生了对美从属意识，这成为日本战后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战后”意识形成于战后体制基础之上，其有着三个来源，即基于宪法体制的和平民主意识，基于旧金山和约体制的历史暧昧意识，基于日美安保体制的对美从属意识。由于战后体制是占领时期在美国主导下日美两国合作的产物，不仅前期与后期美国的占领军政策发生了变化，就是日本统治阶级追求的目标也不同，因此植根于战后体制之上的“战后”意识自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包含着诸多结构性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必然会暴露出来，从而引起否定战后体制与保卫战后体制的对立与冲突。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这些矛盾和斗争一直是围绕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展开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概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77页。

^② 同上书，第385页。

二 独立后对战后体制的挑战

随着 1952 年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国结束了对日占领，日本恢复了主权。在美国的扶持下，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期，1954 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1955 年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1956 年平均个人消费超过了战前水平。另外，在国内政治方面，1955 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其后自民党长期稳坐政权宝座 37 年之久。在国际政治方面，伴随 1956 年日苏邦交恢复，日本得以加入联合国，成功复归国际社会。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1956 年的《经济白皮书》从经济的视点提出了“已经不是战后”的论断。

从美军结束占领前后，日本统治阶级就已经开始倒行逆施，迫不及待地向占领时期的政策开刀。如 1952 年 7 月通过镇压群众运动的《破坏活动防止法案》，加强政府对劳资争议干涉权的《劳资关系法修正案》；1953 年 8 月，通过《限制电力、煤炭行业罢工法案》；1954 年 5 月，通过了禁止教职员政治活动、压制日本教职员工会活动的有关教育两项法案等。另外，在美国的压力下开始重整军备、重新武装，1952 年 7 月将警察预备队改组为保安队，1954 年通过了《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日本进入了重整军备的新阶段。

在此前后，战后被剥夺公职的战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鸠山一郎等陆续解除处分，重新复归政界。他们以“恢复自主独立，修改占领政策”为目标，首先将矛头指向作为占领政策最大成果的战后宪法体制，叫嚷要“制定自主宪法”，“恢复、夺回被宪法夺去的东西”。1954 年 12 月，鸠山一郎在组阁后不久就讲：“修改宪法是必要的，修改占领政策的开端首先是修改宪法”。他还直言，“就是为了重新武装，必须修改宪法。”^① 1955 年成立的自民党也把“修改宪法”作为“立党以来的党是”，在建党的基本文件之一“党的政纲”中，明确载有“谋求自主修改现行宪法，另外重新探讨占领期诸法制，按照国情进行修改或废除”^② 等内容，因而自民党被称为“改宪政党”。

^① 日本综合研究机构编：《90 年代日本的课题》，彭晋璋监译，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63 页。

^② 自民党：「党的政纲」。<https://www.jimin.jp/aboutus/declaration/>

但是，面对这样的否定战后宪法体制的动向，共产党、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进步势力充满了危机感，他们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使反对修改宪法的斗争增强了力量。进步人士认为，战后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是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最大成果，还是战后和平民主主义的总根源，因此护宪斗争是一场关键性的斗争。1953年11月，片山哲等组织发起了“维护和平宪法之会”。1954年1月，以此会为中心组成了有135个团体参加的、代表日本广大人民意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它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团体和人们集结在一起，成为全国性护宪斗争的中坚力量。“拥护宪法国民联合”提出了制造拥护宪法的国民舆论、在议会中确保阻止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势力和在国民投票时否决宪法修改案等活动方针，广泛开展了护宪活动，形成了护宪高潮。虽然自民党改宪势力强行在国会中成立了“宪法调查会”，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党在国会中议席的增加，使修宪势力在国会中未能达到提出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结果使其修宪目标受到挫败。

在“独立自主，改变占领政策”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动向。如前所述，1951年订立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可以镇压日本国内的骚乱，但没有明确美军保卫日本安全的义务，也没有事先协商的约定。这种形式上明显不对等的条约，伤害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自尊心，于是在条约到期前日本开始和美国协议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但新条约明确规定，为了维持日本的安全以及对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美国的陆海空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则有义务保卫在日本施政领域中的美军的安全；一旦日本的安全或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双方应立即协商，并“在遵循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维持并且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① 新条约的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极大警觉，担心被卷入美国战争的心理升温。于是，面对这样的加强日美安保体制的动向，共产党、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进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人民群众也用包围国会、集会示威等方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日本概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86页。